



坡底的阳光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砺刀石

乡村公路在大足龙水镇的丘陵间绕出一道弧线，导航提示抵达时，车子只好停在急转弯的边上。窗外是40多度的斜坡，青瓦小院嵌在坡底，像被群山半含在嘴里。小董老师攥着教案本的手指泛白：“校长，我们送教上门的张雨涵的家该是这儿了。”

斜坡是一条约莫50米长的水泥路，应该是政府为了保证坡下的几户人家的安全和出行而修的。我俩沿斜坡路走下去，有种身子往前坠的感觉。张雨涵爷爷已在院坝摆好长凳，奶奶抱着个两岁多的小姑娘从堂屋出来。三面小院嵌在坡谷里，农村小院少见的干净整洁。柴垛码成方块，镰刀挂在墙上像幅画，连鸡笼都垫着干净的稻草。屋前是一个大院坝，院坝边上修了1米多高的围墙，使小院有种温馨的安全感。

“张雨涵，老师来了！”堂屋里出来个胖乎乎的女孩，口水顺着嘴角淌，脖子上的白毛巾随着颠簸晃悠着。她的眼睛歪向不同方向，看见我们时亮起光来，像被云翳遮了大半的星。她跌跌撞撞扑过来，喉咙里发出含混的音节，小董老师慌忙扶住她，指尖触到孩子温热的皮肤，忽然红了眼眶。

雨涵奶奶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。“我们家艰难些，张雨涵是老大。当年她妈生她的时候，都是好好的。生下来三天查出黄疸过高，东拼西凑10多万砸进去，还是成了这样。”“毕竟双方父母都没有家族遗传病史。我们又计划着生第二个孩子，还好，是个正常的男孩，取名张兴旺。心想着这下子正常了吧，再生老三，不想又得了跟老大一样的病。”雨涵奶奶顿了顿，往堂屋努努嘴。我们这才从院坝往堂屋里面望去，堂屋的木椅上还躺着一个女孩，10岁左右，四肢蜷缩成虾米，脖子下面的白毛巾浸出明显的口水痕迹。“那是老三张雨霏，比雨涵的病还严重些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也是黄疸闹的。”“老四这丫头正常，明年可以上幼儿园了。”雨涵奶奶望着怀里的小女孩欣慰地笑着。爷爷补充道：“她们爸妈在深圳打工，家里就我们老两口守着。”

我们坐在院坝的长凳上，看张雨涵在院坝内歪歪扭扭地走。她的脚总往外侧撇，每一步都像要摔倒，却又执拗地往前挪，像被风推着叶子。雨涵爷爷说，去年她趁人不注意翻过围墙，滚到坡下的菜地里，浑身是擦伤却没哭，只是睁着眼睛

看天。“现在这围墙加了半尺高。”老人的手在膝盖上搓着，骨子里透着农村人的朴实和韧劲。

“校长，这送教上门的课怎么上呀？”在回去的路上，小董老师突然问我。后视镜里，那座小院渐渐缩成一点，被漫山的绿意吞没。“先让她知道，有人记挂着。”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，路两旁的野菊花开得正盛。

往后的日子，我们成了那条斜坡上的常客。小董老师每周都去，有时带班里的孩子，把院坝变成临时课堂。孩子们教雨涵数数，手指，她总把五个指头捏成一团，却笑得口水直流。我偶尔回去，带些饼干、瓜果，大家开心享用。有次带了绘本，雨涵的手指在图画上慢慢划过，像在触摸另一个世界。

第二年春季开学，我和小董老师再去，坡上的野蔷薇开得如火如荼，小院依然整齐干净。院门口的椅子上，多了位约80岁的老人，春寒料峭，她正眯着眼晒太阳。厨房飘出白菜的清香，一个矮胖的身影在灶台前转着，听见动静回头，围裙上沾着点点水痕。“是杨校长和董老师吗？”她的声音脆生生的，眼睛在烟火气里亮得很。这是雨涵的妈妈。

“这次过年，我们两口子回来的，今年，雨涵爷爷奶奶外出打工了，我在家守着，雨涵爸爸在就近的龙水镇干活，晚上能回来。门口的老人是雨涵的曾祖母，轮流供养，一家吃半年，现在轮到我们家。”锅里的水咕嘟响着，像在给她千丝万缕的家务伴奏。她转身给张雨涵换毛巾，动作麻利得像变魔术一样。孩子脖子上的毛巾永远洁白，身上的棉服虽旧，却洗得发亮，没有一点异味。堂屋里，她隔会儿就过去帮雨霏翻身。四妹在院子里追着鸡跑，曾祖母坐在门口少有言语。阳光穿过小院，把春天的暖都揉进了进来。

“您受累了！”我看着她额头忙碌的汗珠说。她正往菜板上切白菜准备午饭，刀刃起落间，白菜帮发出清脆的断裂声。“遇都遇到了，总不能让孩子活得不像样。”这句话像颗

石子投进我心里，漾开层层涟漪。

“我是贵州人，打工时认识孩子他爸的。”她笑着看张雨涵摇摇晃晃走过来，伸手稳稳接住，“当初家里不同意，说重庆太远。可他人好，再难也没抱怨过。你看这孩子，虽然病了，但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不可能扔了吧！日子再难，还好一家人都帮衬着，现在政策也好，再加上自己勤快一点，生活也不成问题！”

离开时，四妹追出来，把一把花生塞到我手里。雨涵站在院坝边，歪着身子挥手，脖子上的白毛巾像戴着爱的领巾。她妈妈从堂屋里走出来，阳光落在她微胖的脸上，像镀了层金。走上斜坡时，身后的身影越来越小，却像枚图钉，把那个瞬间牢牢钉在心上。

送教的路走了许多年，见过太多折翅的天使。有的家庭被苦难压垮，任孩子在尘埃里自生自灭；有的却像张雨涵家，在泥泞里开出花来。那条斜坡，每次下去又上来，都像在丈量生活的重量。而坡底那座整洁的小院，总在提醒我：“教育或许

不能改变所有，但若能让这些孩子在被爱的目光里多笑一次，便是值得的。”

今年春天再去，小院又加了道铝合金栅栏，雨涵能扶着走得稳些了。她妈妈说：“老二也快初中毕业了，四妹要上幼儿园了，雨霏也能在轮椅上坐一会儿了。”院坝边上新种了月季，是雨涵爸爸从镇上捎回来的花苗。小董老师正教雨涵认“花”字，她的手指在纸上慢慢划过，歪歪扭扭，却异常坚定。

阳光漫过屋顶，落在每个人身上。我忽然懂得，所谓送教，从来不是单向地给予。那些在苦难里依然挺直的脊梁，那些把日子过得干干净净的坚持，早已在不知不觉中，给我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。坡底的阳光总是来得晚些，却格外绵长，把每个平凡的日子，都晒得温湿润润的。



炸不垮的南川城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道勇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地处重庆南部山区的南川，在那血与火的岁月中，也遭受过侵华日军带来的深重灾难。

资料显示，自1939年到1941年，日机对南川城乡进行的轰炸达9次之多，其中对南川县城轰炸5次、对周边乡村轰炸4次，共出动飞机192架次，投掷炸弹520余枚、燃烧弹10余枚，造成202人死亡、272人受伤，损毁房屋1800多幢，2000多人无家可归。

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，重庆主城打出“愈炸愈强”标语，南川老街的墙壁上，也出现了“抗日必胜、建国必成”这些振奋人心的标语。流离失所的人们，并没有被炸弹吓倒，而是高声唱起《南川县城第一次被炸歌》。这些歌声和《黄河进行曲》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》一样，带给了人们强大的精神支撑，是南川抗战期间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日机对南川的前三次轰炸，分别是1939年1月7日、5月10日和8月30日，地点分别是乾丰、金山（小河）、鸣玉，均为南

川周边山区村镇，这三次轰炸带有一定的试探和侦察性质。三次轰炸共投弹6枚，造成5人死亡、7人受伤。

损失最为惨重的是1939年10月13日上午10时，日机对南川的第四次轰炸，这也是日机对南川县城的第一次轰炸。这天正是南川城区的赶场天，因此场面惨烈，损失也最为惨重。当天，日机出动飞机18架，在弹丸之地的南川县城投下88枚炸弹和5枚燃烧弹。这次轰炸，事后的登记显示：死亡人数171人、受伤164人、炸毁房屋871栋，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，城墙坍塌，东门、北门被毁。

炸弹、燃烧弹引起的街道房屋着火燃烧，使整个城区变成一个火海。空袭过后，中午时分，老百姓试图冲进城里救火，被政府和驻军持枪把守城门的兵丁挡住，错失救火时机。县城几乎成为一片灰烬。目击者说：“城内竟有侯团长（指驻军团长侯冠三）的士兵和一些流痞进入商店住房，任意拿取贵重财物。散处在城外未受伤害的人们，尽都心如刀割，涕泗直流，眼巴巴地望着城内烈火燃烧。”外患加上兵痞，南川人民只能跌足长叹。

1939年12月19日（一日两次）、1940

年7月9日、1940年7月28日、1941年8月14日（均为公历），日机对南川县城及石溪乡又进行了5次投弹轰炸。这5次轰炸造成42人死亡，98人受伤，炸毁房屋970余栋（间）。

其时的南川，只是重庆南部山区一个小小的县城，工业不发达，又非军事要塞，却引来日机如此之惨绝人寰的大轰炸，可见日本军国主义之毫无人性，置无辜老百姓身家性命于不顾。究其原因，据时任国民党南川党部书记长章楚翹回忆，南川山高洞多，其中丛林海孔洞是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所在地，日本间谍向日军部报告飞机制造厂“日产飞机20余架”，日军寻找飞机制造厂无果，故而对南川进行大轰炸，造成无辜百姓受难。

南川人民是炸不垮的。当南川县城第一次被炸后，有市民在炸坏的房屋残垣上书写“抗日必胜 建国必成”大字标语，现在仍然保存着，成为永远也不能磨灭的纪念和记忆。市民李兴洲创作《南川县城第一次被炸歌》，曲调铿锵明快，极大地唤醒同胞抗战意志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“同胞们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要记住十月十三……那一天日本飞机投下百余颗炸弹，毁灭我祖

遗的南川。”南川县城于同年12月19日遭到第二次轰炸后，李兴洲再次写下《南川县城第二次被炸歌》：“南川领空轰隆隆，敌机二次逞凶横……顿时北门烟火升，房屋倒塌尸首陈。讨还血债莫停留，雪恨复仇，雪恨复仇，有敌无我，争取民族解放与自由。”

这是一种不屈不挠的凛然斗志和斗争精神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周应培等一批南川的革命知识分子，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，成立中共南川特支。他们秘密领导和推动南川抗日救亡运动不断走向高潮，也不断推动这种斗志和基因传承发展。

这是我们纪念抗战胜利的意义，也是我们生生不息的灵魂！

